

## 結論



1927年7月以降，武漢國民政府陷於一陣慌亂；年底，曾經顯赫一時的總政治部，也隨同該政權於兵燹、政潮中殉葬。在這幾個月裡，鄧演達毫不見蹤影，外界時有若干揣測，卻少有人目睹他究竟身在何方。

原來，武漢國民政府分共後，鄧演達頗感楚歌四面、孤掌難鳴。他決定遠適蘇俄，可是，長江下游有「蔣家軍的封鎖」，豫陝則為馮玉祥的勢力範圍；而甘肅一帶，亦有新近歸附南京政府的「馬家軍」<sup>1</sup>。為此，鄧演達只好偕同極少數親信，化裝成查電線桿的工人，由6月30日起徒步沿京漢路至鄭州，再西行經陝甘蒙古的大戈壁。一路上，鄧兩次被人睹破真面目，只是沒有受到為難。路程中，一行人過潼關後，始得混入撤退回國的俄國顧問車隊，8月15日，才安抵莫斯科。<sup>2</sup>

在莫斯科，鄧演達與宋慶齡、陳友仁決定成立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」，是為日後「第三黨」的前身。同時，8月17日，鄧演達於共產國際召開的歡迎會上，發表了〈中國革命最近的研究局勢之由來〉講話，鋪陳他對國民革命遭逢「背叛」的看法。鄧演達描述蔣介石為代表「封建資產階級」的獨裁者，絲毫未提曾經共事的經過。通篇文字裡，鄧演達不斷強調「群眾」的革命性，面臨軍隊叛變和領袖變節的危機，終遭失敗命運。汪精衛成了搖擺不定的傀儡首領，領著一班「封建地主」譚延闓、「投機政客」徐謙、「病態的教授」顧孟餘、「買辦官僚化的留美學生代表」陳公博，「去寫了武漢中央背叛革命的供狀，並且宣告了『中國國民黨上層領袖的出殯路由』」。<sup>3</sup>鄧演達的意願，是恢復「真正國民黨左派」領導，聯合共產黨等革命勢力，繼續努力國民革命的未竟目標。可是，這一廂情願的看法，

<sup>1</sup> 師綸，〈西北馬家軍閥史略〉，《甘肅文史》5（1989），頁6-10。

<sup>2</sup> 方述，〈鄧演達先生的生活〉，毅君編，《鄧演達紀念集》，頁5-6。

<sup>3</sup> 鄧演達，〈中國革命最近的研究局勢之由來〉，曾憲林、萬雲主編，《鄧演達歷史資料》，頁150-164。

受到莫斯科當局潑了一身冷水。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員布哈林（Nikolai Bukharin）冷峭批評：「自1917年以後，世界只有共產主義革命，更沒有國民革命」。<sup>4</sup>共產國際更無意再支持中國「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」，決由共產黨直接行動，武裝奪取政權。加以鄧演達堅持「民族自決」原則，反對共產國際的擺佈，至是，在備受攻擊的聲浪中，1927年底，鄧演達秘密離開了莫斯科，轉赴柏林。<sup>5</sup>

至是，原先在武漢受左傾團體簇擁包圍，聲勢不可一世的鄧演達，不得不暫行與共產黨分道揚鑣。惟旅居柏林期間，鄧演達仍日以繼夜地索讀書籍，試圖以「辯證唯物」、「歷史唯物」的觀點理解中國歷史發展、經濟組織、農民、財政、外交等問題。這段時日，鄧演達遊歷甚廣，1928年夏季，甚至上了北極圈，抵達歐洲極北的尖島。成了他追隨者口中：「亞洲人的足跡到此者，恐尙以先生為第一人！」<sup>6</sup>

1930年2月下旬，鄧演達履踐到了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。他相信，在農民問題方面，保加利亞是中國將來最好的典範。<sup>7</sup>3月初，又往土耳其新都安哥拉旅行，十分推崇土耳其革命的成就（這一點，顯然與共黨意識型態不同）<sup>8</sup>。鄧演達認為：土耳其政府站在商人的地位，而意識上代表「全民族」。這一點，同中國智識份子「完全與生產的社會脫離」，相去真不止天壤。尤令他深受刺激者，是新土耳其在政治、風俗、新拼音文字等事物，展現出令人羨慕的氣象。鄧演達的追隨者回憶：「先生每每在土耳其的小城市中，看見警察所及市政府、郵政局旁邊代寫書信的先生們，已經是用最新式的打字機，曾為之流淚！」<sup>9</sup>

1930年5月，鄧演達行經巴格達、印度德里、拉合爾、特利時等地，返抵中國。<sup>10</sup>數年來的海外流亡生涯，無疑使鄧的革命意識型態有了不少淬練。未久，便開始著手他的「第三黨運動」——8月9日，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」，接槩「平民革命」的大纛，聲言推翻「蔣介石的反動政權」，並且反對

<sup>4</sup> 質樸，〈關於莫斯科的一封信〉，《革命評論》2（1928.05.13），頁38。

<sup>5</sup> 〈鄧演達先生傳略〉，《鄧演達先生遺稿》，頁16-17；楊逸棠，《鄧演達》，頁59-60；張耀杰，〈宋慶齡與共產國際〉，《傳記文學》91：2（2007.08），頁4-18。

<sup>6</sup> 方述，〈鄧演達先生的生活〉，毅君編，《鄧演達紀念集》，頁10-11。

<sup>7</sup> 方述，〈鄧演達先生的生活〉，毅君編，《鄧演達紀念集》，頁18。

<sup>8</sup> 土耳其在軍事強人凱莫爾（Mustafa Kemal Atatürk）統治下，是典型的反共政權。蔣介石在各處文字中，常流露稱羨。反共甚力的胡漢民，也說新土耳其做到了蔣介石口中的「黨軍隊化，軍隊黨化」，參閱胡漢民，〈國際考察的一個重要報告〉，《中央半月刊》2（1927.06），頁4-5。鄧演達一般被視作親共，卻同樣有讚揚土耳其的想法，尤不能忽視。

<sup>9</sup> 方述，〈鄧演達先生的生活〉，毅君編，《鄧演達紀念集》，頁19-24。

<sup>10</sup> 丘挺編著，《鄧演達年譜》，頁45。

「更反動」的北平擴大會議<sup>11</sup>、以及「陰謀與盲動」的中國共產黨<sup>12</sup>。

從歸國日至1931年8月被捕，短短一年餘，鄧演達寫下多篇第三黨運動的重要文獻。那麼，鄧如何總結當年主持軍隊政治工作失敗的經驗，提出改進的革命方法呢？1931年6月25日，他在〈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——平民革命？〉一文中，特別強調復興中國革命，須建立一支「平民革命軍」。平民革命軍有別於日趨「腐敗」的國民革命軍，是代表農工平民的，是同平民政權密接不離的，是官長和士兵生活無甚大差異的。毫不令人訝異，鄧演達沒有忘記他曾投身的國民革命軍，他寫道：

政治訓練於軍隊的生命，也就是平民革命軍的神經系統。過去的國民革命軍的政治訓練祇是表面的。——所謂「賣膏藥」！——而且在整個反動統治的隸屬下，除了進行無關痛癢而擁護軍閥個人的所謂「政治工作」（反動軍閥們嘲笑政治工作人叫做賣膏藥者，甚或叫做姨太太）外，也必然無其他工作可以被允許表現出來。如果人民已經起來，則平民革命的社會性格必然更加清楚而確定。這樣，平民革命軍的政治訓練，就是訓練農工平民的大眾自己，就是叫自己明瞭犧牲及作戰的目的，而永遠不會被野心家所利用。<sup>13</sup>

鄧演達進一步主張，中國革命必須先用武力打倒蔣介石，奪取政權。他以「黃埔革命同學會」為骨幹，分頭策動各地軍人，發起反對南京的軍事行動。鄧演達在一篇來不及發表的手稿裡，承認在落後的中國，「群眾的興起」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到。因此，運用既有軍隊，猶屬必要。為了確保革命成功，鄧提醒黨人在奪取政權的前夜，須做到「當地黨的工作已有相當基礎」，以及「發動的軍事力量能在我們黨指揮底下」。不僅如此，取得局部地區的政權後，應立即設置「平民革命軍幹部訓練班」，要旨如下：

（平民革命軍幹部訓練班）目的在把黨的軍事工作人員，及各職業團體的青年領導者加以武裝的訓練，以擔任新的軍隊幹部的工作，這個訓練班的要旨在：切實的了解過去軍隊中的腐敗、貪污的習慣，而澈底的掃除之。

<sup>11</sup> 北平擴大會議，係由汪精衛、陳公博等，與西山會議派鄒魯、謝持聯合實力軍人間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等，召開另立國民黨黨統的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」。見：陳進金，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（台北：國史館，2002），頁97-129。鄧演達與第三黨人，拒絕公開支持。

<sup>12</sup> 鄧演達，〈中國到哪裏去？〉，《鄧演達先生遺稿》，頁9。

<sup>13</sup> 鄧演達，〈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——平民革命？〉，《鄧演達先生遺稿》，頁261-262。必須補充說明的是，鄧演達還認為，和「政治訓練」同樣重要的是「勞動訓練」。

同時，在新的原則上面，即提高士兵的生活，減低官長——尤其是上中級軍官——的生活，軍隊社會化及政治化的要點上面，去養成新的幹部及學習新的訓練法、管理法，使人民的武力能逐漸的形成。<sup>14</sup>

無庸置疑的，這幾條粗淺原則，尚不足以應付雜沓的中國時局，粹練出一支真正「人民的武裝」。只不過，鄧演達還來不及提出更多看法，就於1931年被捕處決，為他的革命而亡。但我們可以肯定，鄧演達生前對他曾經手的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，亟表不滿意。

像鄧演達這樣失意份子，很容易對1920年代國民革命的結果，感到失望。然而，我們不宜忽視，這場革命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，形塑中國新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化格局，影響迄今猶存。對當時人而言，思想所受的衝擊也是十分深刻的。北伐戰爭尚未結束，天津《大公報》已經評論稱：「楚歌過河，粵謳渡江，此中國歷史上之劇變，而尤為近年馴伏北洋派勢利之下人民，所夢想不及者」。<sup>15</sup>更重要的是，不少北方知識份子認為，「黨軍有主義，有組織」，遠勝於「注重物質上之實力，而忽視精神上之團結」的北軍。<sup>16</sup>當時還未與國民黨親近的胡適，也屢次公開或私下讚揚國民黨「軍黨一體化」制度，認為它遠勝北方「赤裸裸」武力、形同「一盤散沙」的軍隊。<sup>17</sup>名知識份子張君勱，對國民黨實行黨化政治，頗有訾議，卻又承認國民黨之所以成功，約有三因，莫不與軍隊政工有關。擇其要者錄於下：

一，主義之昭示 ……

二，軍隊之政化 主義之標舉易事也，所以灌輸於人人心目間者，於文人尚易，於軍隊獨難。北洋兵卒，問其何以為戰，必曰為餉銀也；北洋軍官，問其為何而戰，必曰長官之命也，個人之功名也。反之南軍之中，自軍部師部，無不有政治部，以為之宣傳；故軍事有正確之政治知識，立於黨之指導下，努力作戰，其所以戰者既早有明瞭之目標，則擄掠之行，不待告誡自不發生，此軍隊之得力於政治化導者二也。

三，民眾之合作 軍隊所致之地，有政治部以隨之，一方訓練兵士，一方向群眾宣傳。更從而組織之，有農民會、工人會，如是黨義普及於民眾，

<sup>14</sup> 鄧演達，〈我們奪取政權之直前及直後應該做的是什麼？〉，陳卓凡、楊逸棠編，《鄧演達先生遺著》，頁250-255。

<sup>15</sup> 〈社評：南北勢力變遷〉，天津《大公報》，1927.06.06。

<sup>16</sup> 淵泉，〈主義之流行〉，《晨報》，1926.10.21。

<sup>17</sup> 羅志田，《亂世潛流：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》，頁237；《胡適的日記》（台北：遠流，1989），1926.10.08條。

而民眾之與黨部、黨軍，無扞格之弊；乃至於行軍之際，伏子之召集，糧食之供給，無往而不得地方之助。與北軍所至，人民堅壁清野以相待者，不可一同日語。故政治部之設，不獨號召黨員，且增加行軍便利。一言以蔽之，民眾之合作，實為之也。<sup>18</sup>

綜上所述，軍隊政工究竟是北伐軍的制勝利器，抑或只是軍隊裡的「賣膏藥者」，甚而是無足輕重的「姨太太」，已成了學者困惑的難題。的確，受到革命史觀影響，共產黨人、或國民黨左派，在北伐初期之宣傳及組織民眾之工作的成效，常被誇大。在純粹軍事立場上講，這些工作雖有裨益，卻甚少發生決定性的影響，因為汀泗橋、賀勝橋、武昌與南昌之攻城戰以及河南、南潯鐵路上的爭奪戰都是本格的戰鬥，其勝敗由戰場決定，不由民眾向背決定。<sup>19</sup>晚近亦有學者認為，過份強調「宣傳」工作，乃是一種歷史神話（myth）；它對全國性輿論或許影響很大，但對作戰並沒有太大幫助。<sup>20</sup>

惟究其實際，任何戰爭的宣傳工作實效，都難以評估，並武斷地予以評價。<sup>21</sup>如果我們不拘泥於爭論「宣傳」是否左右戰局，反更能省思政工制度作為中國的新軍制，反映著中國新的政治文化。郭沫若曾活靈活現地在回憶錄中描繪，自廣東出發的第四軍伏役，因為落後隊伍，一面蜂擁而上軍用列車，一面高聲痛罵維持秩序，企圖阻擋的第八軍士兵稱：「吊那媽，耐牟害（你不是）革命軍？耐害反革命的北洋軍？……」<sup>22</sup>若傳統上社會地位不高的軍伏，都能脫口而出這樣的話，又豈是偶然？不可否認的，過去研究少有令人滿意的討論，原因之一在於缺乏對戰時最大、且最有效率的宣傳機器，軍隊政工，予以系統的考察。

首先，就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的創始理念言之，毫無疑問，是襲自俄式黨軍體制。然而，我們不應忽視，五四前後中國知識份子對「兵」作為社會問題的思索，亦是重要歷史根源。<sup>23</sup>連結到革命黨人對暴力機制運用的策略，就成了中國新軍制誕生的契機。至於這套制度，能否裨益茁壯國民革命軍，白崇禧曾謂：

<sup>18</sup> 張嘉森，〈一黨能獨治耶？〉，《晨報》，1926.12.05。

<sup>19</sup> 黃仁宇，《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》（台北：時報，1994），頁76。惟黃氏未提及河南戰役，為了與本論主題切合，乃於行文中添入。

<sup>20</sup> 羅志田，〈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〉，《新史學》5：1（1994.03），頁87-109。

<sup>21</sup> 越戰的研究，或許很能說明這種困境。參閱：Robert W. Chandler著、許明雄譯，《美軍在越南的宣傳戰》（台北：黎明，1985），頁60-69。

<sup>22</sup> 郭沫若，〈北伐途次〉，《沫若自傳：革命春秋》，頁8。

<sup>23</sup> 呂芳上，《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工作（1924-1928）》，頁7-18。

這制度是二元制，等於明代的「監軍」，對指揮官指揮作戰諸多掣肘，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中缺點甚多，不是好的制度。蘇聯實行這制度後來也發生毛病，這種黨代表在軍中重視政治訓練，以致軍事訓練不夠嚴格，而且忽視軍中的「階級服從」，在指揮上必然地不易順利。<sup>24</sup>

考量到軍事指揮官與政工主管時有緊張關係，單從純粹軍人的斷語，或非公允。然而，這至少可以說明，政工制度能否裨益軍事行動，實有相當大的討論餘地。另有軍官認為，政工人員「主要任務在聯繫民眾及負責部隊的精神教育。作戰前士氣的鼓舞還是要靠主官，因為主官的訓練較好，且富作戰經驗」。<sup>25</sup>其實，軍隊作為一種社會組織，涉及的問題，絕不限於火線上的衝殺。舉凡部隊經理、醫療衛生、文娛、軍民關係，無不需要相應的機關管理。蔣介石於1950年就指出：

（共軍）實在沒有好的武器，亦沒有特別好的學問，但他們怎樣可以打勝我們？他們就是靠他嚴格的組織、訓練、管理并有計畫的宣傳……因為他們管理周密，他們的政治指導員和黨代表都能擔負起組織和管理責任，而且能一面組織一面就能管理宣傳，尤其能實事求是，徹底執行他的計畫和命令。所以他們雖穿的比我們壞，吃的比我們差，但是他們士兵卻少有逃亡的。而我們的軍隊呢？無論他士兵是怎樣來的？或是買的？或是頂的？或是逃來的？部隊官長一概不問，士兵的籍貫究竟怎樣？家庭經濟怎樣？那更是不知道，甚至連士兵的名字和面貌也不認識，就隨隨便便發給他武器，這豈不是危險之至！外國人軍隊因為他們的戶籍辦得完整，但是他們對於這些，還是特別的注意和考察。而我們戶政不良，又隨便如此，萬一發生變故，就無從稽考……<sup>26</sup>

這段談話，頗能反映中國受限於落後國情，軍事組織遠不如西方國家嚴密，亟待改善的情形。惟1920年代，蔣介石等人確有運用政工制度，「補助」部隊主官不足，代掌經理、衛生的想法。<sup>27</sup>軍官出身的黃仁宇，評論稱：「當初蔣介石在廣州時以共產黨人擔任軍中之政治工作，只希望他們不預聞純粹的軍事問題，以保全統帥權之完整。殊不知俄紅軍創建時之體制，以沙皇留下之幹部為職業性之軍

<sup>24</sup> 賈廷詩等訪問紀錄，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84），頁806。

<sup>25</sup> 陳存恭、張力訪問，《石覺先生訪問紀錄》，頁434。

<sup>26</sup> 蔣中正，《領袖訓詞（五）軍事改革要項》（台北：國防部政治部，1950），頁30-31。

<sup>27</sup> 蔣中正，〈校長第二十九次訓詞〉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編輯，《黃埔叢書》精神教育，頁183。

官，以黨代表監視操縱並傳達中樞之指示，其觀念可謂與蔣之設計用心相反」。<sup>28</sup>在本論看來，蔣介石並非「不知」俄式黨軍體制涉及了二元領導，政治監察等問題，只不過在國共對峙未白熱化以前，尚有運用政工人員，進行基層工作，改善兵士生活的願望而已。這一點，也能說明北伐時期總政治部業務的不斷擴充。凡是國民革命軍組織未備者，常有委託政工組織接辦的情況。是以俄顧問加侖嘗謂：軍中「衛生科等，應歸政治部處理，方覺便利」。<sup>29</sup>

不可否認的，國民黨歷次對黨代表、或政工人員權限的規範、重申，無不揭示「政治監督」的作用。然而，國民黨內固有若干「以文人制裁武人」之聲，卻未曾遏止軍人集團在社會中擴張影響力的趨勢。況且，正如本論指出的，中國軍隊政工制度創設的過程中，軍方自始至終皆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蔣介石是以軍人身份，赴俄考察紅軍組織；又以軍人身份，主持黃埔軍校的籌建。即便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，蔣介石以武力拘捕黨代表，確實衝擊到政工制度以黨治軍的威信。但我們不應忽視，蔣介石是以中國軍隊政工制度倡議者的身份，<sup>30</sup>說出黨代表制係「余手創者，即有由余廢除之權」一段話。<sup>31</sup>易言之，所謂「黨指揮槍」，並非是「文黨指揮武黨」，也無法等同於西方學者「文官宰制」理念。<sup>32</sup>加以北伐前夕，蔣介石執掌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，權限遽幅擴大；甚至將最高政工機關總政治部，置於總司令部下，實已模糊「以黨治軍」的理念了。即使是日後反蔣最力的鄧演達，初以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司令行營主任，座鎮武漢，獨霸一方，也是根源於國民黨軍權的高漲。無怪乎1927年春天起，革命陣營內部「以軍治黨」的質疑聲，會日囂塵上，成為寧漢分裂的重要張本。<sup>33</sup>

耐人尋味的是，武漢政權高揚的「黨權運動」大纛，其中又滲雜共產黨人捭闔縱橫的手法，不能視作純粹的國民黨內部軍、黨之爭。這一點，自然與1920年代國民黨之聯俄容共有關。曾任北伐軍政工的黃埔一期生冷欣，就回憶道：

最好笑的是，北伐軍每道一個地方，團以下的政工人員必定要開一次軍民聯歡會。結果是，由共黨方面人士主持的，就大說他們那一套。我們主持

<sup>28</sup> 黃仁宇，《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》，頁76。

<sup>29</sup> 〈軍務善後會議第1次會議錄〉，1927.01.03，南昌，石印件，黨史館藏：一般441/9.1。

<sup>30</sup> 毛思誠主編，陳布雷校訂，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，1926.04.08條。

<sup>31</sup> 毛思誠主編，陳布雷校訂，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，1926.04.02條。

<sup>32</sup> 權借鄭曉時之語，參閱氏著，〈政體與軍隊：台灣文武關係（1950-1987）的一個分析架構〉，頁139。

<sup>33</sup> 騰波，〈以黨治國聲中的以軍治黨〉，漢口《民國日報》，1927.03.26。

的，就對百姓說我們的，大家各行其是。<sup>34</sup>

共產黨人在北伐期間，大量以國民革命軍政工人員身份活動，即時人所謂「共產黨人亦言三民主義」，卻造成了「名稱雖同，註釋則異」的情況。<sup>35</sup>俄式黨軍體制，本須與意識型態相榘。在國民革命軍，反出現一支「主義兵」隊伍內，有嚴重意識型態紛爭的窘狀。

只不過，重視下層工作的共產黨人，確實為中國的政治文化灌入一股新氣象。早在1926年11月初，總政治部一面辦理戰火甫熄的武昌之善後，一面即籌組通俗講演委員會，擬派人赴通俗講演所、國語統一會、佛教講演所、首義公園講演，試圖將政治生活帶入市井小民的生活中。<sup>36</sup>到了河南戰役期間，武漢北伐軍的政工人員，又為了適應民情，採行「說大鼓書」、「演西洋鏡」，發送「俗語小冊及韻語告示」。<sup>37</sup>另外，還編寫反奉之大鼓及梨花等俚詞，交由藝人演唱。<sup>38</sup>1920年代以降，日益增多的政治宣傳活動，採取面向群眾的作法。<sup>39</sup>這些活動的效果，固不必誇大。可是，正如某位國民黨左派人士所指出的，「(軍隊)政治工作有軍隊式的極嚴密的組織和系統，份子易於整齊」，適於投身民眾運動。<sup>40</sup>

稍可議者，是鄧演達沈迷於民眾已經「起來」，忽視「男女老幼，視群眾運動為畏途」的可能性。這說明了何以「右傾」軍人調轉槍口時，「革命群眾」並沒有如共產黨人描繪的那樣揭竿而起。的確，鄧演達深信1920年代國民革命包含「社會革命」的使命，<sup>41</sup>加以左傾份子的簇擁，<sup>42</sup>使他過低估計革命的障礙。固然，1927年夏天後，「黨指揮軍隊」一句話，已成了空懸的理想。不特「以軍治黨」，並且是「以軍分黨」，凡軍事所及的地區，黨部也跟著變遷，凡黨部負責的人員，無不

<sup>34</sup> 黃肇珩、胡有端、徐圓圓，〈北伐統一五十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〉，《近代中國》6(1978.06.30)，頁74。

<sup>35</sup> 〈社評：三民主義〉，天津《大公報》，1927.06.08。

<sup>36</sup> 〈總政治部之政治工作會議〉，廣州《民國日報》，1926.11.05。

<sup>37</sup> 〈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上中執會呈〉，1927.05.22，武漢，毛筆原件，黨史館藏：漢12998。

<sup>38</sup> 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前方總政治部第二次工作報告〉，1927.06，武漢，毛筆原件，黨史館藏：漢13000-2。

<sup>39</sup> 李健民，《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86），頁30-40。

<sup>40</sup> 〈張敦對黨務政治軍事意見之陳述〉，1927.09.01，漢口，毛筆原件，黨史館藏：部10495。

<sup>41</sup> 國民黨之北伐，是否包含「社會革命」，在許多學者眼中，是持否定的態度（如鄒讜，《中國革命再闡釋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78）。惟在鄧演達眼裡，確實堅持社會革命路線。這一點，正是他與黨同志緊張關係的根源。

<sup>42</sup> 據報人羅敦偉回憶，他曾投考總政治部職員，卻被疑心右傾，「折開彌封，分數第一，鄧演達主張錄取我，別人都反對，所以取不了」，見氏著，《五十年回憶錄》（台北：中國文化供應社，1952），頁46。就像北伐前夕決定宣傳大隊人選一樣，鄧演達又再一次遷就左翼份子的意見。

有軍事作其背景。但我們不宜忽視，鄧演達主事時代的總政治部，雖號稱為黃金時代，實則軍隊政治訓練的錯誤在於「宣傳不統一」、「人才不充足」、「範圍太擴大」、「運用太錯誤」、「軍官的恐懼和厭惡」。尤有甚者，北伐前期軍，「只有政治部與人民聯歡，沒有見到下級士兵和人民的聯歡」。<sup>43</sup>這說明了何以國民革命軍看似光鮮，實則無法淬練成「真正黨軍」的道理。

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，在鄧演達或同時代人眼裡，第一個打擊確實是國共黨爭，致使各部隊政工組織，屢受左右政潮摧殘。次為國民黨人調整民眾運動策略，令政工人員無由發揮力量。1928年前後，國民黨中止大部分的民眾運動，原因固然很多，惟總政治部既然在戰時曾肩負「指導」民眾的職責，自屬難辭其咎。《國聞週報》評論稱：「先是蔣介石與共產黨本不相容。去年北伐，勉強合作。實則政治部為共產份子活動之大本營。而戰事勝利，得力於政治部者至多，其功不可沒。然因共產黨既別有用心，故兵力所致，輒由共產份子，或接近彼等把持黨部，組織民眾，手段又太拙劣，遂為眾怨之府」。<sup>44</sup>其情可見一斑。

在軍隊政工由監護者，降格為宣傳員後，整整1930年代，國民黨內「黨權」與「軍權」的紛爭，有增無減。國民黨人雖建立中國第一個黨化政權，創設第一支黨化軍隊。惟政治體制轉型，並非一蹴可及。這些紛擾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也反映著近代中國史的複雜性。

<sup>43</sup> 陳公博，〈今後的國民黨〉，《革命評論》1（1928.05），頁6-14。

<sup>44</sup> 〈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〉，《國聞週報》4：32（1927.08.18），頁1。

